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编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章开沅学术与人生

Zhang Kaiyuan



Xueshu Yu Jiaosheng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章开沅学术与人生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生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开沅学术与人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ISBN 978-7-5622-4834-7

I. ①章… II. ①华… III. ①史学—文集 ②章开沅一生平事迹
IV. ①K0-53 ②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9550 号

章开沅学术与人生

编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②

责任编辑:何军华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9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4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定价:35.00 元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总序

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真正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少数知名大学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批又一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现今华师的奠基与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丰功伟绩。

现今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从规模、设施、师资与教学科研水平哪一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自己历史上的那些前身。但这些前身毕竟为今天学校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学校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一种无可取代的宝贵资产,其中包含的有些重要无形资产甚至远远高于其相关联的有形资产。由于这方面的感悟日深,许多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旧有的典籍、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迟至今日只能说是亡羊补牢。但更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要数延续学脉与传承精神。高校不是一般的教育机构,乃是学术文化延续的载体。学脉是学科孳生繁衍的谱系,精神是众多学科群共生互动焕发的校园神韵,而兼任两重载体且流光溢彩于百年岁月之间的则是那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学者。

王缁尘撰《汉学师承记评序》云:“《汉学师承记》者,清乾嘉时江氏藩之所著也。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物,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思想。以此学术思想,由此人物而流行支配于社会政治间,而此民族文化遂发生变动而或以之衍进焉。准是以言,则学术思想实民族文化最重要之

因素。”宋元明清学案之作勃兴，佳构巨制比比皆是，而王氏高明之处则在于突出探究学术思想，而非停留于仅仅陈述“经师之事迹与授受之源流”。其评论最精彩之处是阐释各个时代学术思想之关联：“且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与前一时代、后一时代之学术思想，皆有密切之关联。或为反对前之学术思想而产生，而其时尚扬前时代之余波；或为启后之学术思想而殞死，而其时已露后一时代之萌蘖，此其不能划然分割者也。”王氏此处讲的虽是影响覆盖整个社会的宏大学派，但类似的现象在校园学科之间也不胜枚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对学者业绩及其思想，大体上都可以作如是观。

华师百年，才人辈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这其中与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恽代英，他36岁慷慨就义，留下遗著300万言，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了几十部厚重著作；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他的著作不断再版，在学界影响甚大，许多已经成为研究历史、文学的学者的必读书；逻辑学家、哲学家詹剑峰先生，他在西方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墨子和老子研究方面浸淫很深。还有杨东莼、包遵宾、韦卓民、黄溥等，这些都是华师历史上灿若群星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华师历史上也曾留下过足迹，如冯友兰、王亚南、吴宓、游国恩、傅懋勤等，他们也是我们这所老校的骄傲和财富。出版社已推出的“桂岳书系”（8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年来优秀学人的探索轨迹和学术成就。

华师精神是“忠诚博雅，朴实刚毅”，在这精练的八个字的启发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倾力打造一个学术品牌，名为“华大博雅学术文库”。其中，国学出版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推出了《张舜徽集》的一、二辑共10册（第三辑三种5册也即将付印），“道家道教研究书系”中也收录了詹剑峰先生研究老子的著作，《钱基博集》已经进入整理阶段，将成为我校出版社“十一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另外，韦卓民先生对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的译作也在分阶段推出。我们设想，以“立足教育，弘扬学术”为指引，出版社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不断地提

高学术品位，推出学术精品，而挖掘百年老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将是工作的重心之一。

在推出百年华师历史上学人的著作的同时，我们也想到，对这些学人进行研究，研究他们的生平、治学生涯、学术思想，无疑可以更进一步推动对他们学术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有些青年学者做过一些工作，出版社就曾经出版过《张舜徽和清代学术史研究》，但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此次有机会推出《恽代英年谱》和《钱基博年谱》，出版社也设想借此机会推出一个新的书系，着眼于研究百年华师历史上成就卓越的学者和他们的学术，丛书名拟订为“华大学人研究书系”，一方面可以将以往已经出版过的相关图书进行整合，另一方面也主动策划一些选题（如年谱、评传、专题研究以及相关人物的研究资料汇编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推出可以激发对前辈学人的深入研究，从而弘扬百年华大的学术传统，以期华大学脉世代绵延！

章开沅

2006年冬于桂子山之实斋

目 录

上篇 学术人生：章开沅与史学研究

把人生追求落实到推动史学发展	罗福惠(3)
“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章开沅先生“参与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严昌洪(16)
论章开沅先生的史学思想与实践	苏全有(28)
筚路蓝缕，推陈出新	
——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	朱 英(42)
倾心半世纪，领潮海内外	
——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许小青(51)
追求和解与和平	
——章开沅先生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彭 剑(73)
跨文化对话：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现代化解读	
——章开沅先生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陈才俊(89)
求索于“思想”与“时代”之间	
——章开沅先生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管窥	何卓恩(133)
章开沅先生的史学思想	王玉德(150)

鸿飞天涯思无穷

- 从《鸿爪集》看章开沅先生与中外学术交流 … 魏文享(161)
 章师、章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高 钟(173)
 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章开沅先生与中国商会史研究 郑成林(184)
 日本:章开沅先生史学研究的关键词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解读 田 彤(198)
 为张謇研究开创新纪元
 ——章开沅和他的张謇研究 蒋建民(225)

下篇 师友琐忆:章开沅治学与育人

- 国际知名史学家创阳光世界 索峰光(235)
 难忘的一段经历
 ——回忆 1979 年和章开沅先生访美 萧致治(278)
 章开沅先生与我的学术生涯 林家有(284)
 章开沅先生的学问与我 [日]久保田文次(291)
 春风春雨老师情 刘 伟 周光庆(296)
 求学犹忆桂花香
 ——桂子山章师门下求学记 王先明(302)
 通往中日关系史的治学之路 赵 军(306)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略谈章开沅老师对我治学道路的影响 马 敏(316)
 桂子山从学琐记 桑 兵(323)
 吾爱真理,更爱吾师 郭国灿(329)
 永远的记忆 郑 焱(334)

山高天近,兰台沐春	王 杰(337)
开沅老师与河南大学	马小泉(353)
丹火正红	
——回忆尊敬的导师章开沅教授育德二三事	游建西(360)
引雏觅食,教人求真	
——浅忆恩师领我走上学研之路	余子侠(369)
史海无涯,章师引航	彭南生(377)
章师开沅先生与武当文化研究	杨华山(390)
先生授我锦囊策,独寻真知为大事	李宪生(395)
三生难报灌顶恩	张艳国(398)
走近章开沅先生	孙丽娟(405)
归鸿传师情	罗福惠(410)
后 记	(439)

上 篇

学术人生：

章开沅与史学研究

把人生追求落实到推动史学发展

罗福惠

在章开沅先生身边受业近 30 年，对先生的为人与为学，自应有所了解，然而多次应有关刊物之约写下的介绍之类，限于对方要求，都成了先生生平事迹和学术成果的罗列。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我曾围绕先生史学思想的“反思”特点和对现代化研究的率先倡导，写过两篇文章，现在重读也难免萌生悔其少作之憾。究其原因，乃在即使是探讨先生的学术思想时，也只是在先生的著述中寻章摘句，然后或归纳或发挥，简言之就是论其文而未深知其人。这就像今天有些人治史，只埋头在文献、数据中爬梳翻滚，既难见人也难知世，因而缺乏史感。

先生的为人学，一贯具有锐意进取的特征。历时越久，这一特征越发明显。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生的思虑愈大愈深，其丰厚的思想因遇到若干更能自由发挥的时空平台而得以伸展，加上先生乐于提携后进，总是坦诚地把自己的所知所感与学生交流，这些使得我对先生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

中国对于一般事业有成或学有成就的人，人们通常称其“早慧”、“少有大志”，否则就是“大器晚成”。以先生的家世和禀赋，自当属于前者，但他们那一代人自幼少到青年，适逢中国空前的内战和外患，欲求安定的生活和接受系统的教育皆不可得。但种种困境和磨难丰富了先生的早年人生，养成了先生“从不满足于轻车熟路，经常喜欢在荆莽崎

岖的山野作新的追求”^①的性格和志向。这种“追求”的目标,对一个有志青年而言,不是盛满稻粱的“饭碗”,也不是温馨的家庭,而是和生命一样重要的“新知”。因为“新知”才能帮助青年树立正确远大的人生志向,引导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向独立富强。先生曾在多所小学、中学受教,也曾辍学流浪,还从过军,最终进入大学未曾毕业就奔赴解放区,既是环境所迫,也是人生志向使然。

志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职业则多为客观所定。只有人生志向与职业融为一体,职业才会提升为志业,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按先生的说法,他与史学结缘,还是由于“革命的需要”,即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由组织上安排到高校讲授中共党史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与先生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所得的知识积累和方法训练,显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先生从此告别了曾经朦胧憧憬过的文学梦、电影梦或者别的梦,以其高度的适应能力、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极受学生欢迎的历史教师。与此同时,他结合原先受到的史学训练和在革命队伍中学到的唯物史观与方法论,开始对1911年发生的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等加以研究,在1961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成为史坛后起之秀,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革命前辈、学术前辈的赞赏。先生自此不仅以治史为业,而且视治史为对生命意义的终生追求。

史学的魅力在于史学的内在价值和功能本身。从客观上说,史学是人类生命过程纪录的总汇,与整个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息息相关。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早启、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史学同样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明的宝库之一。人们主观上要对这个宝库加以发掘乃至利用,史学的功能就会得以呈现。在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目标之后,历代不同的政治家、史学家对治史和“用史”都高度重视,虽有或者侧重正邪、是非、功罪的评判,或者侧重纲常伦理的人心教化,或者侧重明得失以资经世济民

^① 章开沅:《自序》,《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客观上依旧共同造成了中国史学的丰富和发展。到了近代，一方面是因为外来侵略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一方面是因为世界联为一气而必然出现文化交融和文明多元，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问题因而格外突出，从“国粹”到“国学”，显示的是同一命题。但无论在“国粹”还是“国学”中，从内容上看，史学都处在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位置上。所以先生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先驱布洛赫和历史学家马鲁的话来表达，称“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而史学的根本功能在于“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①。这就是要把史学的价值和功能从资治、惩恶扬善等等，提升到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超越有限期间和某种特定范围的需求，避免“苟从与附合”，从人类的根本特性和终极关怀上来探求和坚守安身立命之所。这是对历史价值和功能的根本性理解，即先生所说的“彻悟境界”。

“彻悟”是一种解放，但又并非彻底的解脱，而是在解放的同时使自己背负上了更重大的使命。先生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或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②。而以治史为志业的人，其使命就是成为“优秀的史学家”，拿出优秀的史学成果。混沌的历史不会自动成为史学，更不是所有的史学成果都称得上“优秀”。所以先生说，“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③；“时间的绵延只属于有意识的心灵”，只有优秀的史学才能赋予时间和历史以生命，使其“顿呈鲜活，表现为运动中之绵延”^④。否则，人类对自己从哪里走过来，现在处在何

① 章开沅：《治史偶感·史学与政治》，《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② 章开沅：《思言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③ 章开沅：《治史偶感·治学不为媚时语》，《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④ 章开沅：《治史偶感·因诗悟史》，《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93页。

处,下一步再往哪里走,都会感到茫然,历史成了黑暗的虚空,人类成了追求满足当下欲望的动物,这将是最大的危险和悲哀。因而迫切需要优秀的史学家“在人类文化的总宝库中,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弘扬而又超然,熔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如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①。这就是历史学家以史学来“参与现实生活”的使命及其实现的道路。

古今中外的历史显示,“参与史学”和“政治对史学的干预”,首先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只不过这两兄弟的关系有时密切有时疏远,有时紧张有时和谐而已。政治总是老大,有它的权威性格,有对各种科学的要求。如果政治环境宽松,对史学的要求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问题,真诚、公正的史学家就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优秀的史学成果自会成批涌现。否则只会相反。此外,史学研究的进行和史学成果的传播,也离不开经济保障,离不开社会对史学成果的关注和认可。种种原因可能造成史学的困境,使得优秀的史学家和优秀的史学成果难以产生。

史学家有理由争取更宽松的政治氛围,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保障,然而更根本的问题,还是史学家的人生志趣和科学态度。先生一贯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为了维护历史学的科学性,史学家应该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②。简言之就是史学要求真实,史学家先要做到真诚。

种种“唯上”、“违心”、“趋附”、“媚俗”,我们的古人称之为“曲学阿世”。种种追求地位尊荣、金钱物欲的目的,古人称之为“取容”。曲学

^① 章开沅:《思言篇·文化危机与人文价值的重建》,《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② 章开沅:《治史偶感·治学不为媚时语》,《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页。

阿世以取容，既造成学者人格的堕落，由此也带来史学品格的堕落。而史学品格一旦丧失，自然会造成庸劣之作，其庸劣之尤可称为“秽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垃圾产品，不唯无益，只能为害。

二

史学如何求真？记得早年章先生偶然引用过一位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话，即将其比喻为“老吏断狱”。但是后来先生不再以此作喻，而是引用布洛赫的话，即“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尽情褒贬”^①，这当中显示出先生治史的观念升华。确实，精明的官吏面对两造截然相反的证词和主张，必须要有全盘的深入了解，抓住要害和本质，判断是非真伪，然后根据法律条文“定谳”。而治史者对于历史人物的功过和历史事件的是非，也要充分了解相关资料和历来研究者的各种看法，然后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治史方法与官吏断狱有些相似之处。但是两者又有根本不同。断狱多半在当下，可以进行现场勘验。而治史的对象则处于已经过去的时空，主要根据文字材料。更重要的是，断狱时只能依据法律条令，而且一对一错，或各方对多少错多少，必须得出一个泾渭分明、非白即黑的结论来。

而史学家对历史上人事的评判，不仅更难于体会当时的情境，尤其是在评判标准上常如布洛赫所说，或者“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或者“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于是“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先生显然对此有感于心，特别提出“历史的公正”，强调史学家的职责不是“依照法律作出裁决”，而是“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这并不是说“评判”及其用以评判的“标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观点”可以完全弃置，而是强调“事实”和

^① 章开沅：《治史偶感·历史的公正》，《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观点”的本末关系不能颠倒。史学的公正尤其表现在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不是一上来就以“正邪”、“是非”、“功罪”等模式化标准为先入之见，然后用经过选择、裁剪甚至似是而非的“事实”来证明所谓“评判”的正确。为了减少及直至克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凭依他人权威”的人云亦云，史学家应该“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充分研究当时当地的情、境、人、事”，“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①。史学家和法官的区别就是研究者和判决者的区别。

先生治史强调“理解”。所谓理解决不仅限于读懂资料，而是大有深意。先生多次引用陈寅恪“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之语，又表示特别喜欢布洛赫“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一语，进而发挥说，“所谓让位，即为古人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借助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动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其心灵深处的奥秘”。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史学家在治史时先放弃先入之见，像现实中做调查研究一样，回到现场而且尽量深入到人的内心，通过体验而形成真正的史感。这样才不会“执今以律古”。

当然“理解”不是把古人和前人的一切都看成是“合理”的。先生特地引用过晚明最具反叛性和批判精神的李贽的两句话，一是读史“得与其人会睹”，“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是“与千古人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处，其心多有不可知处。既已覩破，实不与旧时公案同”^②。李贽这里所说的“其人”、“百千万人”、“古人”等等，应该包括史册所记载的人和编纂这些史册的人。但不论是对于何人，“会睹”也好，“为友”也好，都是通过设身处地的冥想神交，达到如同亲历其境，亲会其人并深入了解其心的境界，从而穿透时空，“覩破”历史的迷雾而求得真相，其认识或结论自然“实不与旧时公案同”，即得出自己全新的见解。

^① 章开沅：《治史偶感·历史的公正》，《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6页。

^② 章开沅：《思言篇·参与史学与史学的参与》，《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